

九十年前出版的《山雨》，是王统照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书写北方农民命运的标识之作。

这部小说起草于1932年9月，于12月上旬完成。按《跋》里所说，王统照和叶圣陶谈及小说的酝酿是在“九·一八”前夕，动笔写是在“九·一八”后。

显然东北事变的事实刺激了他，他为此放弃了有关“济南惨案”题材的写作计划，在那部小说中，他原拟写“日本兵士的心理矛盾”。于现实而言，这份可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思辨自然不重要了，他得写“崩溃”与幻灭，以及农民自觉。

1931年春，王统照在四平东北第一交通中学任过一学期教职，其间，他游历白山黑水做了系列考察。“十字街头蓬首回，绽裳在手走徘徊。年年苦补劳人服，难补山河寸土灰”，是他在《东北杂诗》里的感怀。

在回青岛写成的《北国之春》中，首篇即《被检察的“小学教员”》，写了在船上遭遇日本“便衣警察”搜查的窘境；在《红日旗的车中》，他感觉到了“到处是邻人的话，到处是他们的规矩”；与他在济南山左学堂同过学的K君是兴安屯垦区“总头目”，曾在东京炮兵专科学校留过学，K君不仅告诉他这个衰老的国家要列在近代国家中“作科学的比试”，还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做了极具战略意味的抵抗预言：“须要中国将海岸线的口岸抛弃，诱敌作陆上战争，以中国兵民的力量避免正面的大战，作袭击与不定形的争斗，确能胜任，可是相当的牺牲自不能免。政府最好往四川移，在中原地方与之相持……”

自东北归来的王统照有了更深切的家国意识，这与他的众生悲悯、民族情感碰撞遇合，催化了更大图景的文学构划。

他的众生悲悯、民族情感在写《山雨》前早有充分显现，其中以“现德丸”沉船事件写就的短篇小说《沉船》是此间的代表作之一。这篇小说刊发于1927年11月10日出刊的《小说月报》，写于1927年10月22日。“现德丸”沉船事件发生于1927年9月17日。

由红石崖赴青岛的日本客轮“现德丸”号，载客限定154人，实载466人，行至黄岛附近海面时因超载沉没。9月23日的《晨报》有报道称，“兹将各属淹毙之人数分志如下：莒县182名，沂州20名，沂水24名，费县12名，临沂12名。而最惨者，莫若许文瑞、孙全两家。许一家14口人，只许文瑞一人遇救。孙全父母兄弟共14口全行淹毙。亦云惨矣。现在小港码头捞获尸首120具。大港又涌现男女尸32具。由警厅及总商会备棺成殓，以便掩埋。并令获救之难民分往大小港及西陵一带认尸……”

《沉船》正是基于对这一事件的想象完成的创作，诸多场景和细节的营构显现了王统照不俗的小说家天赋。而这些由乡村经红石崖前往青岛小港的农民，是要换乘更大的船自青岛到大连，然后“闯关东”。在《沉船》中，王统照塑造了剃头匠刘二曾一家，他们用两块多银圆挤上了日本小火轮，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一条不归路。

《沉船》同时也写到了小知识分子的沦落——在红石崖经营“独石”客栈的店主，在乡间已无学生可教，只好在“无道邦”里“独善其身”。

“现德丸事件”发生后，尽管胶澳商埠当局和蒙难者亲属强烈要求日本驻青领事馆从速严办“现德丸”船长以公愤，但日本领事馆在三次审理中都以“理由尚不完备”为借口拖延判决，后竟宣布“现德丸”船长无罪开释。

这件事引起了很大震动，王统照不仅很快完成了《沉船》，而且看到“沉船”背后更大的瓦解，即《山雨》的题旨——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瓦解。

在《山雨》中，像奚大有这样的中农家庭都面临无法在乡村继续生存的窘迫，更不屑说像萧达子这样的贫民了。因此就有了像徐利那般与恶势力殊死一搏的农民，也有了杜烈、杜英等向城市移民的人。只不过，与杜烈、杜英相比，奚大有是混沌的，而《山雨》的精彩处正是这份混沌。

与奚大有相比，尽管有不乏清醒的人，但这清醒一如宋大傻一样，是没有明确出路的。《山雨》的这份模糊性，既是知识者无望的张望，也是现实看不清的抉择。有时候，模糊未定才是时代和小说的迷茫处。

还要特别提到的是，1932年的王统照远非欧游归来的王统照，甚至不是1934年5月在旅途中写《青岛素描》的王统照。他对城市还保持有一定的疏离，他的心意与爱恋还在乡村。

《山雨》中的王统照是幻灭的。一如陈庄长下着雨的葬礼，充满了辛酸与悲情。王统照对陈葵园这种新派人物也是不抱希望的，无论他们管教育还是做议员，都不会成为挽救这个社会的力量，相反，他们转身成了投机者和渔利者，是另一种形式的官僚、军阀乃至土匪，不同的是，他们挥舞着民主与共和的幌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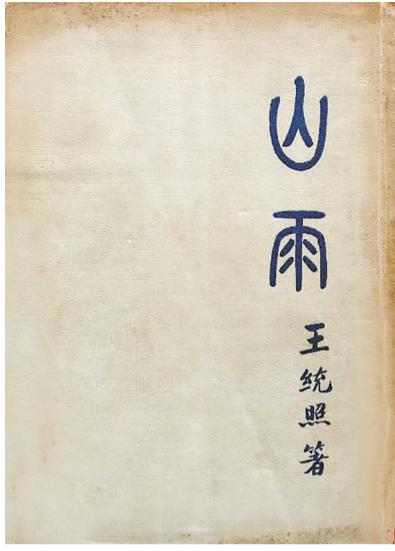
因而，在《山雨》中移居城市的奚大有，无论摆小摊、扛大包，还是拉洋车，都不能成为最终自我拯救的出路。其间的一点微光，恰是大有在铁工厂做工成长、向他传递新信息的儿子，还有杜烈、杜英兄妹，他们在城市中的成长与沉浸，渐渐成了觉醒的可能。这觉醒也许有进步人士祝先生的指引，但不排除也是城市文明洗礼的结果。对背着农民烙印的奚大有来说，无论指引还是洗礼，均还模糊不清。

《山雨》的结尾，因此挪用了日本居留民团打砸民国日报社、火烧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这一事件作为结尾。在王统照看来，殖民主义、军国主义的势力，在中华大地上一时难以肃清，它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，转化为目空一切的强力。

而对这国，对这国之民，要在“烧吧、烧吧”中，等待毁灭后重生的降临。

或可以说，王统照是带着幻灭感和模糊性走上欧游路途的。这份即将发生并展开的行进，将使王统照清晰许多。一如高仁俊的话：“只有以科学作为比试力，才能真正救中国。”

作者简介:臧杰，青岛文学馆馆长，一级作家。



## 《山雨》出版前后的王统照

臧杰

## 何以樱桃如此“红”——青岛市话剧院新剧《樱桃红了》赏析

李苑



《樱桃红了》剧照。市话剧院供图

青山绕北宅，樱桃红千家。春夏之交的樱桃，是仙山孕育的美食，是九水滋养的鲜红，是青岛人难舍的心头好，更是崂山百姓心中不变的“甜”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说到乡村振兴，在这里不再是简单的“致富”，而是发自内心对故土的热爱，对共同富裕的期盼，对新农村家乡发展的认同。这是青岛独具特色的乡村风貌，更是一曲浪漫的新农村之歌。

青岛市话剧院新近推出的力作《樱桃红了》，就是这样一首唱给崂山、唱给青岛的歌，是近年来青岛乡村振兴题材难得的佳作。该剧以极具辨识度的崂山乡村气息，为观众铺陈开一幅既有美感又接地气的乡村画卷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编剧廉海平老师从几年前“马向阳”的扶贫题材一路写到“北宅”，写出了农民富裕后的农村变化，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捕捉到当下中国的变化。

导演将鲜明的地方特色、入心入耳的青岛方言、简约且诗意盎然的舞台设计巧妙融为一体，无一不在对观者叙说这是一部属于青岛的原创力作。

青岛人的情义，在这出戏中被写得令人动容，既有喜悦轻快的乡村生活勾勒，又有饱蘸笔墨的人物内心戏，乡亲情、故土情、兄弟情带着泥土的味道，和着地道的方言，呈现在舞台之上，在同质化严重的话剧舞台交出了属于青岛的答卷。

《樱桃红了》是根据崂山真人真事改编。这种创作方式，是话剧创作的艺术源泉，也是窠臼。写过真人真事的作者难免有这种感觉，要么被人物事迹的高尚“绑架”，要么在真实和艺术创作中有所顾忌。现实主义艺术作品要好看、耐看不容易，特别是对青岛市话剧院这样一个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国有院团来说，如何在叫好和叫座之间取得平衡更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难题。

剧本不是好人好事的堆砌，就一定要去生活中去打捞、去浸泡。该剧的编剧和主创都曾经去崂山采风，加上本土剧团对生活的熟稔和演出特色，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一部“青岛故事”，就像北京人艺鲜明的美学特点，辽宁人艺的“关东学派”，《樱桃红了》舞台导演艺术的精妙之处体现了鲜明的“青岛味道”，这是文化万千气象中的立命之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樱桃红了》不但找到了自己的风格，而且是一部可以代表青岛风格的好戏，也一定是一部传得开、有百姓口碑的好戏。

百姓看戏讲的就是一个“接地气”，当演员们收放自如的青岛话出现在舞台，总能让观众会心一笑。然而真正的“接地气”却不仅仅是说方言那么简单，总要通过舞台呈现生活的本真，又不全部是生活，是凝练的生活，是艺术的表达。编剧、导演和“青话人”一起延续了剧院一贯的创作风格——诗意的现实主义。旋转的舞台，宛如悠长的山间小路，首尾呼应的诗句，让人一下子沉浸到中国特有的田园牧歌之中，最让人惊喜的就是每场戏结束的一段“交谈”，篇幅不长，但是画龙点睛，很有戏剧艺术隽永的美感。

同时，该剧关注了新时代农村的乡村振兴，党员干部如何扎根在土地里，工作在人民中，而我们的人民又如何热爱着土地，在热情与乐观的奋斗中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驻村干部是近几年艺术创作中常常出现的形象。这出戏的驻村干部是一位女性，她所展现的新时期女性的美与力量，宽厚与智慧是一个崭新的舞台形象。她在面对姜文龙和康老四争执的时候，用一种最质朴的方式去解决，这是典型的“山东”解决方式。台词质朴而动人，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说着人物的内心，也将剧中情节引向高潮。她了解这方水土，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。两届村主任的矛盾，是年轻时代的爱恨情仇，这情结的起源恰恰是对故乡的情深，对出走与归来的思索。

和大女主相比，姜文龙和康老四这两个角色则浓缩了更多的时代缩影——从进城务工，到有了一番成就，从事业失败到回归家乡，从意志消沉到带领村民共同富裕，他们身上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民的意志品质，更是崂山人特有的恣意与洒脱。和其他很多地域的农民不一样的是，崂山的农民对家乡的偏爱，用俗语来说就是“千难万险，不离崂山”。所以康老四作为从未离开崂山的农民的缩影，更有了符号意义。正是这种深深的扎根，让他一路走来坦荡中有些顽固，坦诚中有些骄傲，故土在他身上是情深也是牵绊，对赵玉花的爱也许就是对年轻时代遗憾的追寻，所以当他最后做出和解的决定时，更能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成长。

除了三位主角，剧中出场不多的配角，或诙谐或婉约，或俏皮或可爱，都是一个个充盈着活力的个体，展现着乡村生活的力量和希望。戏剧终归是人的艺术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让这出戏分外饱满和值得品味。

樱桃之美，崂山之醉，让这出戏在现实主义中呈现出难得的诗意，而舞美则是这种诗意最直观的体现。舞美之美，不在于盛大。近几年，我们常常在舞台上看到巨大的装置和造景，绚丽的灯光，激越的音响，然而如果剧情不足以支撑，反而会被反噬。《樱桃红了》令人惊喜之处在于解决了风格与创新的问题。在符合风格的前提下进行舞美的创新——美得克制，美出了中式的简约。有一幕场景是夜晚的山村，舞台呈现了一个宁静的山坡，几座房子点缀山中，玻璃窗中透出点点灯光，就是这一点点灯光，点亮了整个舞台，也点亮了醉人的诗意，铺陈出中式写意的乡村夜景。

像这样的场景，在整出戏中还很多，恰到好处的转台，一桌三椅的“劝和”场面，雨夜转移村民，景与情、人与物、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地呈现在舞台。

艺术与时代同行，艺术记录时代。《樱桃红了》是新农村建设的记录，是新时代乡村风貌的记录，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抹“红”。何以樱桃如此“红”？因为有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，有热爱这片土地的艺术工作者，他们砥砺前行，用心浇灌，才有这江山多娇樱桃红。

作者简介:李苑，青岛市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，曾上演、发表剧本多部，评论散见于各大媒体。